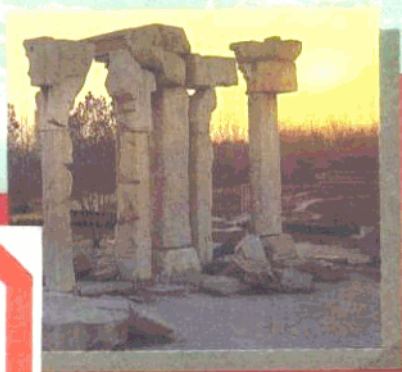


近代西方列强侵华史丛书

江西高校出版社

太阳旗下的血光

汪祖德 陈庆发 著



近代西方列强侵华史丛书

江西高校出版社 著

太阳旗下的血光

汪祖德 陈庆发 著



(赣)新登字第007号

书 名: 太阳旗下的血光
作 者: 汪祖德、陈庆发
出 版
发 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南昌市洪都北大道16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照 排: 江西震华公司照排中心
印 刷: 丰城市印制造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3.75
字 数: 87千
版 次: 199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元
ISBN 7—81033—440—9/K·19

邮政编码: 330046 电话: 8331257、8332093

(江西高校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近代西方列强侵华史丛书》编委会

主编：汪 祖 德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 志 远

王 东 林

刘 晓 明

何 大 进

陈 庆 发

陈 解 生

程 德 林

E/5/1P

编者的话

中华民族已经走过五千年文明史的发展历程。在这漫长历史的时空中，中国为世界所仰慕，放射出高度文明的光辉。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备受列强欺凌，陷入了领土被瓜分、主权被强夺、资源财富被劫掠、人民遭奴役的悲惨境地，滑向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深渊。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华儿女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反对殖民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迎来了民族和国家的新生。

耻辱的历史已经过去，中国与西方大国又开始交往。昔日的仇恨可以消解，但绝对不可遗忘。肩负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我国青少年，要明耻发愤，知史图强，让祖国的古代文明重放异彩，现代化建设再创辉煌。

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为青少年朋友所喜爱，而成为你们的良师益友！

一九九四年七月

前 言

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近邻。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它与中国有着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而在维新之后,自身还受异域列强侵略的日本,竟以西方强盗为师,迅速走上对邻国进行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中国是受其侵略时间最长、灾难最为深重的国家。

从1874年到1945年的71年里,日本发动和参加了十次对华侵略战争。战争的恶魔夺去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神州大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一片腥风血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在旅顺进行了血腥大屠杀,灭绝人性,是一群披着人皮、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本世纪二十年代,日本三次侵占山东,制造了震撼中外的“济南惨案”;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把这座六朝古都变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令人目裂发指、肝肠寸断。日本政府还倚仗军事侵略的淫威,强迫腐败无能的中国反动统治者签订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割土地、索赔款、抢财富、劫资源,攫取关税协定、领事裁判、铁路建设、矿山开采等一系列特权,榨尽中国人民的脂膏。我们的祖国,山河破碎,千疮百孔,几乎陷入亡国的绝境。日本侵华的罪行,“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但是,具有顽强战斗传统的中国人民,决不屈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于苦难中同仇敌忾,奋起反抗。1874年,日本首次发动侵华战争,就遭到我国台湾高山族人民的坚决抵抗,迫使日军陷入困境。1894年9月,平壤保卫战,左宝贵血染平壤,为国捐躯;黄海大战中,民族之魂邓世昌高呼:“不要偷生!不做

俘虏！”与全舰官兵共沉大海，表现了他们宁死不屈的崇高民族气节。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英勇献身，国民党爱国将士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人民百年御侮史上最辉煌、最悲壮的篇章。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重振民族雄风，重塑民族之魂的一个巨大转折点。她像一座巍峨的丰碑耸立在历史长空。

回顾过去，日本侵华 70 年那血淋淋、悲切切的国耻史，每一位炎黄子孙都不应该忘记那些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壮丽捐躯的先烈。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应该为那些气贯长虹，光照日月的壮举而骄傲和自豪。展望未来，每一个中国人都将爱国情深，报国心切，化仇恨为意志，为祖国的振兴和强大，为中华民族永不受列强欺凌、宰割、压榨，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顽强拼搏、战斗。

今天，日本侵华的历史虽然已经逝去，但它仍沉甸甸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心头，因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还时隐时现。为了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我们必须牢记日本侵华的惨痛教训，永远不让这历史的悲剧重演！

目 录

前言

一、锋芒初露	(1)
“失之欧美,取之亚洲”	(1)
背约兴师	(5)
江华岛风波	(11)
吞并琉球	(14)
二、甲午风云	(19)
蓄意开战	(19)
黄海悲歌	(23)
“万忠墓”的英灵	(27)
春帆楼屈辱订和约	(31)
台湾保卫战	(36)
三、东洋称霸	(40)
远东宪兵	(40)
“北守南进”	(43)
强盗厮杀	(47)
分裂中国,夺取满州	(51)
四、“天佑良机”	(55)
虎去狼来	(55)
“五·九”国耻日	(58)
郑家屯事件	(62)
巴黎和会的“公理”	(66)
五、“铁血主义”登台	(70)

田中首相的奏章·····	(70)
日寇三占济南城·····	(72)
三洞桥大帅罹难·····	(75)
铁蹄踏遍东三省·····	(77)
“一·二八”日军三易统帅·····	(79)
关东军导演“满洲国”·····	(83)
白山黑水·····	(86)
“北平”怒吼·····	(89)
六、走向战争深渊·····	(92)
血染芦沟桥·····	(92)
板垣难过平型关·····	(95)
屠城血记·····	(97)
鏖战台儿庄·····	(100)
“731”恶魔·····	(102)
百团大反攻·····	(104)
冈村宁茨的毁灭扫荡·····	(106)
狼牙山上壮士悲歌·····	(108)
落日黄昏·····	(110)

一、锋芒初露

“失之欧美，取之亚洲”

中国近代有一位政治家曾经预言，日本在效法西方之后，必将得到迅速的发展。他说：

“日本邦近与花旗帮（即美国）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

这位政治家便是太平天国著名领导人洪仁玕。日本后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反映了这位政治家敏锐的观察力和真知灼见。然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立即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这倒是他以及当时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始料所不及的。

其实，一向被清政府视为“东夷小国”的日本，早就对自己一衣带水的近邻怀有侵略野心。

明治政府成立前，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吉田松阴便提出了“失之欧美，取之亚洲”的主张。他向幕府建议道：“在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应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明治政府成立后，被派去朝鲜调查的佐田白茅回国后，也建议通过侵略朝鲜和中国来解决日本所面临的问题。他说：“当今日本，实在是患兵多而不患兵少，这些兵将颇好战斗，有可能酿成相互间的残杀和日本的内乱。现在幸亏有个朝鲜，可以让将士们发泄一下压郁在他们胸中的好战之气，这样既可以一举而征服朝鲜，让我们操练一下军队，又可以大耀皇威于海外。……如果清朝出兵援救的

话，则可以一并讨伐之。”

这番议论，杀气腾腾，要拿朝鲜和中国作为日军发泄兽性的对象，听来令人毛骨悚然。这便是日本统治集团为了医治日本社会的弊病所开出的一具“良方”。

除了让将士们发泄“好战之气”外，掠夺海外市场也是日本侵略朝、中的主要原因。由于明治维新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日本广大人民依然受着沉重的剥削，生活贫苦，购买力低下，从而造成了国内市场的狭小。因此，日本当时急于对外扩张，掠夺海外市场，以满足其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国内便兴起了一阵“征韩”的喧嚣声。但是由于日本国内尚未稳定，还不敢贸然对中、朝用兵，因而日本政府决定通过外交手段，为实现其“失之欧美、取之亚洲”的政策创造条件。

1869年1月，明治政府派人出使朝鲜，要求修复邦交。日本政府在致朝鲜的国书中说：“我皇即位，重整纲纪，亲理万机，极愿睦邻。”但朝鲜当时与中国存在宗藩关系，认为只有清朝皇帝才有资格使用“皇”、“敕”等字样，因而便以日本国书不符合格式为理由而拒绝接受。

日本在与朝鲜的外交受挫后，便决定首先与中国订约，取得与中国平等的地位，然后再以上国的身份同朝鲜交涉。1870年7月，日本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奉命前来中国，试探签约的可能性。

清政府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们办理外交，屡遭洋人欺凌，因而他们总以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于日本的要求，他们的答复是：

“中国与贵国久通和好，交际往来，已非一日。缘贵国系邻近之邦，自必愈加亲厚。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嗣后仍即照前办理，

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

柳原见清政府以“大信不约”拒绝其要求，便奔走于曾国藩和李鸿章之间，极力游说。他对李鸿章说：“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于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拒之。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柳原如此措词，切中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心意。于是，他上书总理衙门，极力主张与日本订约，认为如对日本“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作外援，亦可以稍事联络”。总理衙门最后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同意日本来年派人前来订约。

1871年6月，明治政府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钦差全权大臣，柳原前光为副使，前来中国订约。7月，伊达宗城一行到达天津，与中国方面的全权大臣李鸿章谈判签约问题。

日本方面首先提出以《中德条约》为蓝本，作为双方的谈判基础，企图从中国方面获得同西方列强同等的特权。清政府对此极为吃惊和震怒，这个“东夷小国”竟敢象西方列强那样来对待中国！于是，李鸿章便提出了中国方面的草案。双方几经磋商，最后在中国方案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并于9月13日草签了《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两个条约。为了防止日本与西方列强结盟，条约中排除了“一体均沾”这一最惠国条款，但仍列有“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协定”等内容。

由于这部条约没有列入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因而日本方面认为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并且要追究全权大使伊达宗城的责任。然而，这部条约却使中日之间建立了平等关系，这就实现了日本订约的最初目的，即：取得了对中国的属国——朝鲜的优越地位，从而为它以后侵略朝鲜打开了方便之门。

日本这次订约的本意是想追随西方列强的侵华道路，但欧

美各国却认为日中想订立攻守同盟，担心由此将影响它们在远东的利益，因而对条约内容纷纷提出质询。对此事最为关切的是美国，它在给日本政府的照会中说：

“三四日前报上刊有中日条约的译文，其中有项特殊条款，即：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或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宜。如系事实，即是结成攻守盟约。为此照会阁下，请问此事真相究竟如何？”

其实，在《中美天津条约》中也有同样内容，美国所谓的中日条约的“特殊条款”，只不过是照搬了这些内容。但美国却假装糊涂，大做文章，其目的，无非是想给日本政府一点颜色，警告日本在侵华行动上，不能损害西方列强的侵华权益。

由于外国的干涉和国内军国主义分子的压力，日本政府于1872年春派柳原前光再次赴华，要求改约。李鸿章责备日本失信，拒绝接受日本政府要求改约的照会。柳原自知理亏，只得连声说：“中堂大人所言极是，所言极是，只是在下回国无法销差，还望大人将照会暂时收下。”

日本政府见中国态度坚决，不可能满足它进一步的要求，只得于1873年3月特命外务大臣副岛种臣赴华换约。副岛此行还附带另外两项任务：一是与中国换约后，再以与中国平等的身份去敲开朝鲜的大门；二是摸清中国虚实，为进攻台湾作准备。

这年正值同治帝大婚亲政，副岛换约后，便要求觐见同治帝呈递天皇国书。过去各国公使曾要求觐见中国皇帝，皆因拒绝行跪拜礼而未能实现。因此，副岛在觐见礼节以及与欧美各国公使先后顺序上同清廷发生了争执。

清廷坚持要按中国的传统行跪拜礼，并准备觐见时将副岛

安排在欧美公使之后。而副岛则坚持行三揖礼，并且以日本外务大臣和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要求列在各国公使之首。双方就上述问题争论了四十多天，最后，副岛以回国相威胁，清廷才作出了让步。

6月29日，举行了各国外交官谒见同治帝的仪式，副岛以首席外交大使的身份在各国公使之前，单独觐见了清帝。他在行了三揖礼之后，便向清帝递交了国书。副岛此举，解决了各国公使多年交涉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并为他个人赢得一定的声誉。他在觐见当天给日本太政大臣的报告中洋洋得意地说：

“关于觐见论，自来颇有纠葛，因遂得成功，致各国公使屡次表示以多赖出力相谢。”

副岛在同清廷就觐见礼仪交涉的同时，还派柳原前往总理衙门询问中国同朝鲜和台湾的关系问题。在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的回答中，有台湾番民乃“化外之民”，为清朝“政教所不及”，以及与朝鲜“只有册封献贡之典，此外，更与国政无关”的内容。日本政府后来便抓住这些话，断章取义，大做文章，以此作为向台湾和朝鲜发动侵略的借口。

然而可悲的是，正当日本政府磨刀霍霍，加紧实施其“失之欧美，取之亚洲”的国策时，昏庸的清廷还在做着笼络日本，“以为我用”的美梦。

背约兴师

1874年5月2日，《中日修好条规》墨迹未干，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便率领一支由三千多人组成的“台湾生番探险队”

(实为远征军)，分乘三艘军舰，驶离长崎，向台湾进发，从而迈出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武装侵华的第一步。

日本这次侵台寻找的是一个荒唐无稽的借口：

1871年11月，当时尚处在清朝领属之下的琉球（今日本冲绳县）宫古岛船民69人海上遇风，漂至台湾南部海岸，与当地高山族人发生冲突，死54人。事件发生后，台湾地方当局对此即作出了处理，生还人员皆由福建送回琉球。

这一事件本属中国和琉球之间的问题，与日本无关。但日本却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企图发动侵台战争。1873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等在天津换约后，又到北京进行活动。副岛种臣派副使柳原前光至总理衙门，质问琉球船民被杀事件。

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回答说：“琉球和台湾两岛都是中国属土，属土之人相杀，应由我们自行处理，我们抚恤琉球人，自然会有措施，这与贵国有什么关系呢？”

柳原强词夺理，硬说琉球属于日本版土，并说：“贵国既然知道抚恤琉球人，但为什么不惩治台湾番人呢？”

毛答道：“杀人者都是土著人，所以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正如日本的‘虾夷’人，美国‘红番’人，都不服教化，这种情况，哪个国家都有啊！”

日本立即断章取义，抓住“置之化外，未便穷治”一语，曲解为台湾东部番人居住地不属中国领土，并且据此发动侵台战争。

日本政府这一卑鄙的手段和荒唐的借口，完全暴露了它包藏已久的祸心。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日本统治集团就有人主张攻取台湾和福州。萨摩藩诸侯鸟津齐彬在论述其侵台主张时说：

“吾国介在东陲，诚不可不早为之备。英法既得志于清，势将

转而向东。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以今日之形势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据于亚东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勇武于宇内。”

这番议论，明确地主张日本应该将增强国力，消除外患，建立在对华侵略的基础上。显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这一对外扩张的观点，成为后来明治政府制定侵华政策的理论依据。

日本之所以会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地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这与当时日本所存在的社会和阶级矛盾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明治维新还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广大农民依然受着沉重的封建剥削，生活十分贫困，这就造成了日本国内市场狭小，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日本当时急于向外扩张，寻求海外市场。另一方面，日本许多封建武士在明治维新中，失去了他们原有的职业和特殊地位，因而渴望对外进行军事冒险，寻找新的出路。这种状况，也无疑推动了明治政府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为了实现其对外扩张的野心，日本政府便不择手段地抓住琉球人被杀这一事件，把侵略的矛头直指孱弱并具有广阔市场的中国。

为了侵略台湾，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首先，它通过美国驻日公使德朗聘请精通台湾情形的、原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担任外务省顾问。李仙得接受聘请后，即将一整套有关台湾情况的资料提供给日本，并积极鼓动日本政府侵略台湾。其次，又于1872年悍然宣布琉球为日本的一个藩，与日本府县同列，受内务府管辖。同时，日本还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使欧美列强承认琉球是日本的领土。这样，一方面达到了吞并琉球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可为下一步侵台寻找借口。

当日本政府积极筹划侵台行动时，清政府却一直蒙在鼓中。

直到4月18日，清政府才从外国公使处得知日本即将侵台的消息。但昏庸的清廷仍然认为，《中日修好条规》墨迹未干，日本政府不致如此背信弃义。因此，它在5月11日给日本外务省的照会中还说：“忽闻贵国欲兴师前往台湾，是否的确，本王大臣未敢深信。”就在清政府“未敢深信”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已在台湾登陆。

5月22日，西乡从道指挥日军从龟山向当地高山族人展开全面进攻。面对优势的敌军，高山族人民尽量避免正面作战。他们采用游击战术，利用有利地形，潜伏在密林深处伏击日军。由于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和不断骚扰，再加上当时天气炎热，病疫流行，日本侵略军病死和战死者近六百人，因而士气低落，惶恐不可终日。

日本出兵台湾，使一向轻视日本的清政府大为震惊。5月14日，遂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前往台湾察看，但要求他“不动声色，相机筹办”。不久，清政府便应沈葆楨要求，派遣洋枪队五千人赴台，但仍要求“姑且忍气耐烦，保全和局”。

日本政府见军事行动不利，便任柳原前光为驻华公使，于6月赴华进行政治交涉。7月24日，柳原至天津拜谒李鸿章。李鸿章指责他说：“你日本去年才换和约，今年就起兵来犯，如此反复，当初何必立约？我从前以君子相待，方请准和约，如何却与我丢脸？可谓不够朋友……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

尽管李鸿章以天朝大国的重臣自居，说起话来很不客气，但他急于求和的心情，却流于言表。当柳原谈到准备进京交涉时，李鸿章便对他说：“若不进京去，此事办得倒快些。”显然，李鸿章有意亲手了结此案。但柳原却不领李鸿章这个情，执意要进京交